

复杂动态系统视阈下德语习得初级阶段学习者因素发展研究

景艳燕

南京大学金陵学院 南京

[摘要]本研究从复杂动态系统理论出发,考察德语专业本科二年级60名学生一学年学习者因素的发展路径与互动关系。研究发现:第一,学习者因素发展具有动态、复杂性。温和型的外语焦虑临近专业考试显著上升;工具型动机始终处于高位,且持续攀升,融入型动机则不断走低,且对母语者的态度发生了显著改善;学习者的记忆与情感策略显著提升。第二,学习者因素内部维度互动关系复杂。外语焦虑不与任何变量相关,开放性有待继续研究;工具性动机对记忆、认知、修正和社会策略具有支持作用。

[关键词]动态系统; 德语; 书面语复杂度

[DOI] 10.12252/j.issn.2096-6261.2021.10.347

1 引言

动态系统视域下的语言发展观认为,语言是动态、非线性且开放的复杂系统。该视角注重系统的多重要素及变异性,考虑动态过程及变量间的动态关系,同时注重系统对外的开放性。我们将外语学习的学习者因素视为完整的系统,可以从复杂动态系统的视角来追踪其发展态势,并观察其各维度的相关关系。

2 研究设计

2.1 研究问题和研究对象

本研究是一项针对中国德语初级阶段学习者因素的历时性实证研究,受试为南京市某高校德语专业二年级60名学生,追踪时间为一学年,学习者因素确定为学习动机、外语焦虑和学习策略三项,试图回答以下两个问题:

1. 德语初级阶段学习者因素呈现怎样的发展特征?
2. 德语初级阶段学习者因素内部各要素间相互关系如何?

2.2 量表与统计

测量学习动机的量表主要采用Gardner和Lambert(1959, 1972)的A/MTB,同时也参考了高一虹等人(2003)采用的中国学生英语学习动机类型的问卷。由于本研究额外测量情境焦虑,因此从A/MTB中删除了关于外语焦虑的问题,并从高一虹等人(2003)的问卷中选择了6个关于工具性动机的问题。最终测量动机的量表由18个题目组成,分别测量工具性动机、融入型动机及对外语学习环境的态度。情境焦虑的测量使用由钟思嘉、龙长风(1984)翻译修订的Spielberger等人(1983)发表的状态-特质焦虑量表(State-Trait Anxiety Inventory, STAI Form Y)的中文版,该量表由20个题目构成。学习策略的测量借助Oxford(1990)开发的语言学习策略量表(Strategy Inventory for Language Learning, SILL),该量表包括总共50个项

目,分为六个子量表,分别测试学习者的记忆策略、认知策略、矫正策略、元认知策略、情感策略和社会策略。三个量表均采用李克特量表进行评分,得分越高情景焦虑程度越高,学习动机越强烈,学习策略的使用越频繁。数据收集后,通过Excel软件统计书面语6个变量值及控制性参数数据值。为方便数据统计与绘图,原始数据均只保留小数点后两位。

2.3 数据收集与分析

本研究于一学年内向60名受试共收集1080人次问卷调查(60人*6次*3项),学期内收集间隔为一个月,第一学期收集三次,第二学期收集三次。研究采用以下数据分析工具:

- 1) 数据处理工具。本研究借助SPSS Statistics V25进行数据标准化处理、测算相关系数并进行回归分析。
- 2) 可视化工具。通过Excel对数据进行平滑处理并添加二元多项式趋势线(polynomial trend line),捕捉整体变化趋势(Verspoor & Spoleman, 2010)。

3 研究结果

3.1 学习者因素发展路径

将采集的三项环境因素6次数据绘制成折线图,以展示其发展变化。如图表3所示,上半学年焦虑逐渐减轻,这意味着这时学生的心情日间轻松;下半学年,焦虑逐渐增加,在第五次达到峰值;学期结束时焦虑得到稍许缓解。上半学年,随着时间的推移,学习者掌握了学习节奏,略有自信,下半学年的德语专四考试也相对遥远。下半学年,随着专四考试的临近,焦虑逐渐增强。由此,我们可以说,考试焦虑属于情境性焦虑,与学习环境有关。随着学习环境的变化,特别是考试的要求,会有很大的起伏。通过对焦虑数据进行成对T检验,在第4次和第5次数据间发现了显著差异($M/M 2.43/2.90, P<.01$),这也再次印证了专四给学习者带来了压力在考试前期达到了质的变化。经过对20个题目进行单

因素方差分析,发现有四个题目对第5次的显著差异具有解释力,如“我觉得很平静”“我觉得安全”,相对于其他如“我现在处于非常紧张的状态”,学习者发生显著差异的都是较温和的情绪,他们知道自己即将参加考试,感到焦虑,但不是很紧张,也不是很不高兴。有时这种相对不激烈的焦虑甚至连学生自己都没有意识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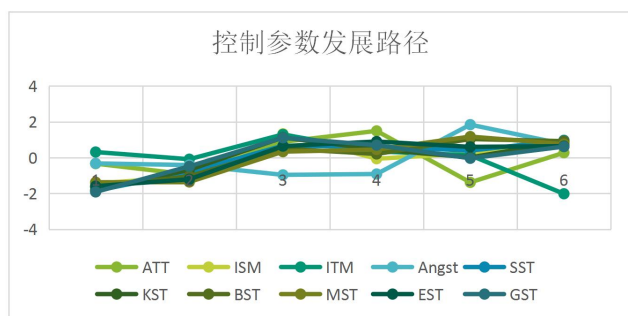
学习动机也是动态发展的。Dörnyei (2005, 83)指出,动机是“一个不断波动的动态因素”,并在不同的条件下发生变化。这里的结果也证明了这一点。工具型动机持续上升,融入型动机持续下降,学生们越来越多地试图实现实际目标,而对融入的积极性较低。此外,事实证明,工具性动机始终处于高位,并发挥着主导作用。它的平均值远远大于其他动机因素。这与以前的研究一致(如Liao 2006, Zheng 2010)。中国的德语学习者更多是将德语学习视为工具,以此获得奖学金、通过考试或找到好工作。这与中国以考试为导向的教育有很大关系,特别是高中的英语学习。对于大多数高中生来说,学习的目的是为了在大学入学考试中获得高分,这种方式在大学阶段得到延续。在整个第二年的学习中,工具性动机仍然是动机的主要来源。与此同时,学生们融入德语世界的积极性持续走低。这与学习者所处的疫情时代有很大关系,疫情时期学习者接触德语母语者和体验德国文化的机会也较少,国外疫情负面新闻也具有干扰作用,融入型动机并未被完全调动,学习者也没有融入德国文化的迫切性。通过对动机数据进行成对T检验,未发现显著差异,表明虽然动机有升有降,但还未达到质的变化。经过对18个题目进行单因素方差分析,发现一个题目发生了显著差异,即“大多数以德语为母语的人都很友好,能有他们这样的朋友是很幸运的”,这反映了学习者对德国和德语国家人们的态度。前两次平均值相对稳定,但第三次出现了显著差异(M/M 3.8/4.28, P=.018)。这说明学生在第一学期的后半段对德语母语者的态度有了很大的改变。与对其他事物的态度相比,如德语、德语教师和德语课,学生对人更敏感,他们对以德语为母语者的态度首先发生了变化。

学习策略各变量在上半学年几乎均有所增加,但下半学年使用频率有所减少,且发展不尽相同,学习策略、记忆策略、认知策略、情感策略和社会策略的总数在前两次增加,然后减少,在学期末恢复。修正策略和元认知策略总是波动的,先是减少,然后增加,最后又减少。此外,修正策

略始终处于最高位,起主导作用,其平均值远远大于其他变量。这意味着,初级节点的德语学习者主要是通过猜测来理解意思,在对话中记不住德语表达时就用肢体语言,或用另一个词代替。这种方法旨在通过猜测或替代来克服对话或阅读中的困难。与其他策略相比,学生主要采用相对被动的学习策略,而不是在句子中使用新词来记忆单词,经常在课外观看德语原声电影或电视节目,或者千方百计地使用德语。上半学年,学生只学了一年的德语,他们还不能在实际生活中使用德语。同时,第一学期的学生使用背诵策略的情况最少。从第一学期末到第二学期末,他们使用的社会策略最少。这也与中国的传统教育有很大关系。对于大多数高中生来说,在现实生活中使用德语或用德语与他人交流始终不是主要策略。他们不认为德语是一种交流手段,而是通过考试和找到好工作的手段。此外,我们已经体会到,他们融入德国文化的意愿较弱。此外,在疫情时代确实没有母语环境。学生们只有一个德语老师。因此,环境也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这就是为什么他们不经常和别人一起练习德语,也不在学习德语遇到问题时求助于母语人士。因此,可以看出,尽管以交流为导向的学习方法多年来一直被强调和普及,但二年级学生在传统的孤立和非交流的学习策略方面根深蒂固。通过对学习策略数据进行成对T检验,发现记忆策略与情感策略在第3次发生了显著差异(M/M 3.46/3.85, P<.05; M/M 3.43/3.83, P<.05)。这意味着,学习者已掌握了更多样、更好的记忆词汇的方法,并且已经注意到自己在学习德语时的感受,并努力分享学习德语的感受,或消除紧张或害怕犯错等不良感受。这两项策略的使用频率达到了质的变化,随后进入相对稳定的学习状态。经过对50个题目进行单因素方差分析,发现显著差异仍然出现在记忆策略和情感策略上,记忆策略变化最大,情感策略变化最小,这表明,学习者主要关注如何记忆词汇。相比之下,其他策略,如组织和转化学习材料(认知策略),分析、计划、评估、监测和组织语言学习过程(元认知策略),使用目标语言进行交流(社+会策略),控制和管理自己的情绪状态(情感策略),以及用其他方法弥补语言的不足(矫正策略),未发挥出作用。学习策略的使用相对来说是单元性的,这可能与教师的学习策略指南有关。

3.2 学习者因素内部维度相关关系

根据系统全面联结与开放性,使用SPSS软件测试数据正



图表 3 学习者因素发展路径

态分布, 根据正态分布测试结果计算各维度内部及维度间各指标的皮尔森或斯皮尔曼双尾相关系数¹。

研究发现, 情境焦虑与其他变量均无相关性。情境焦虑与学生的学习动机如何、他们使用什么学习策略、使用的频率没有任何关系。强烈的考试焦虑并不能加强对学习的强烈渴望, 焦虑也不是产生不想学习的想法的影响因素。与其他系统相比, 情境焦虑并不那么开放, 这实际上与CDST强调的系统的开放性不一致, 应该是没有发现其他相关因素的原因。

学习动机与学习策略具有相关性, 工具性动机与记忆策略、认知策略、修正策略和社会策略紧密正相关 ($r=.905, p=.013; r=.947, p=.004; r=.881, p=.020; r=.887, p=.018$)。通过回归分析, 拟合度良好, 工具型动机对这四项目策略具有解释力²。如果学生产生了强烈的愿望, 把语言作为实现这一目标的工具, 主要会通过背诵单词、组织和分析主题, 以及在使用过程中追赶单词来确保交流顺畅。又或者, 学生会通过不断地背诵词汇、组织和分析学习材料、尝试使用该语言, 并通过抓紧时间使用该语言来确保交流的顺畅, 从而激发学生的学习动力。相反, 通过考试只能被动地增加学习的工作量, 而不能提高学习的积极性。

4 讨论与结语

本研究历时一学年, 通过对学习者因素的追踪, 有以下几项发现: 第一, 学习者因素发展具有动态、复杂性。温和型的外语焦虑临近专业考试显著上升; 工具型动机始终处于高位, 且持续攀升, 融入型动机则不断走低, 且对母语者的态度发生了显著改善; 学习者的记忆与情感策略发生显著提升。第二, 学习者因素具有复杂性。外语焦虑不与任何变量相关, 开放性有待继续研究; 工具性动机对记忆、认知、修正和社会策略具有支持作用; 融入型动机对句法复杂性具有正向解释力。

学习者因素的发展历程、速度、变异性均具有自身独特性, 教师需要根据学习者的学习发展态势, 观察其发展阶段、发展水平与速度, 给予相应指导, 促进学生书面语长期有效的发展。

参考文献

- [1] Hilver, P. & A. H. Al-Hoorie. 2020. Research Methods for Complexity Theory in Applied Linguistics [M]. PA: Multilingual Matters.
- [2] Hood, G. 2004. Poptools [CP]. Pest Animal Control Co-operative Research Center (CSIRO).
- [3] Jarvis, S. 2002. Short texts, best-fitting curve and new measures of lexical diversity [J]. Language Testing, 19 (1): 57-84.
- [4] Larsen-Freeman, D. 1997. Chaos/ Complexity science and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J]. Applied Linguistics, 18 (2): 141-165.
- [5] Spoelman, M. & M. Verspoor. 2010. Dynamic patterns in development of accuracy and complexity: A longitudinal case study in the acquisition of Finnish [J]. Applied Linguistics, 31: 532-553.
- [6] Van Geert, P. & M. van Dijk. 2002. Focus on variability: New tools to study intra-individual variability in developmental data [J]. Infant Behavior and Development, 25: 340-374.
- [7] Verspoor, M., K. de Bot & W. Lowie (eds.). 2011. A Dynamic Approach to Second Language Development: Methods and techniques [C].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6.

*本研究是江苏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项目“复杂动态系统视阈下的三语发展实证研究”(编号: 2020SJA2206)的阶段成果。

正态分布时使用皮尔森相关系数, 非正态分布时使用斯皮尔曼相关系数。相关系数值 >0.65 为强相关, $0.45-0.65$ 为中相关, <0.45 为弱相关 (Wolf-Quintero, et al, 1998), 且在相关性检验下需要满足 $P<.05$ 的条件。

拟合方程如下: $SST = -.004 + .956ISM (P<.001)$; $KST = .002 + .953ISM (P<.001)$; $BST = .010 + 1.011ISM (P<.001)$; $BST = 1.488 + .561ISM (P=.018)$ 。